

# 为无产阶级掌好笔杆

浩然同志谈创作

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七六年一月

# 目 录

- 1、为无产阶级掌好笔杆…………… ( 1 )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札记
- 2、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 ( 8 )
- 3、为无产阶级专政冲锋陷阵…………… ( 16 )  
——在一次部队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 4、发扬敢闯的革命精神…………… ( 28 )
- 5、为谁创作? …………… ( 40 )
- 6、漫谈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几个问题…………… ( 48 )  
——在一个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 7、学习典型化原则札记…………… ( 65 )
- 8、《春歌集》编选琐忆…………… ( 80 )
- 9、关于《金光大道》的通信…………… ( 110 )

# 为无产阶级掌好笔杆

##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札记

手里这支笔，从表面上看来，是很轻、很轻。但是，作为一个以笔为革命斗争武器的文学工作者来说，笔杆，又是很重、很重的！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加，我越来越感到手里这支笔的分量。在深入生活、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在跟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我时时刻刻在想：怎样使自己手里这支笔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是光荣、艰巨、不能推卸的职责。一篇稿子，一句言词，一个标点符号，都应当视为千斤，严肃对待。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我们从事创作的人来说，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我们自己要学习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改造世界观，防止变成修正主义的笔杆；第二、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深刻地、本质地认识和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满腔热情地塑造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自觉献身的英雄典型，使作品起到“**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作用。

我们要为担负起这样光荣的任务奋斗终身！

千斤重的钢铁和巨石，可以用机械去掌握它、调动它。文学工作者手里的这支笔杆，只有靠握笔人的思想来掌握、来调

动。握笔人的思想怎么指挥，笔杆就怎么运转，他的世界观什么样，他的作品的政治和艺术的境界就什么样。作品是作家思想水平的水位计，半点虚假都是掺不了的。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对无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学习不够自觉。我片面地认为，自己当过基层干部，又当过新闻记者，

“政治水平”是不低的，因为过去上学少，所缺乏的只是艺术技巧。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我比较重视党在某一阶段的具体政策学习，而忽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刻苦钻研。在一定程度上，我是以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来指挥手里这支笔的。我知道，是党从旧社会苦海里把我拯救出来。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而且成了文化的主人。我感激党，感激人民。我决心用手里的笔杆歌颂党、歌颂人民。我的作品，都是写新人新事、好人好事。这固然也能在一个时期内起到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鼓舞群众，配合当前中心工作的作用，可是，这样做是很不够的。我的作品，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写的《喜鹊登枝》，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写的《杏花雨》，将近一百个短篇中，所反映的农村现实生活，大都是一片和平兴旺，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没有高大的英雄典型。即使反映了人民内部新与旧的思想冲突，也站得不高，挖得不深，没有达到揭示生活本质规律的高度。我主观上要配合政治斗争，但手里握着的这支笔杆，却是软弱无力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指示，思想觉悟提高了，政治观点更明确了。我开始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指挥手中的笔杆，写了长篇小说《艳阳天》。接着，我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看清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激烈的、严峻的路线斗争，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这个伟大真理。我努力用党的基本路线指挥手中的笔杆，写出《金光大道》的第一、二部。

这样粗略的回顾，一方面使我觉悟到，一个革命作家的立场和观点对他能不能为无产阶级紧握手中的笔杆起着决定作用；同时，也使我认识到，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灯塔和方向盘，因此，也是一个立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生活和创作实践的灵魂。只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为无产阶级掌握手中的笔杆。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闭门修养”式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既不能精通，更不能应用。必须结合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我们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来认真学习，才可能从精通到应用。应用得好，就会更加精通。在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群众斗争生活中，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观察、认识生活现象，才能真正搞清楚理论问题，并且不断丰富创作的素材。

怎样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观察、认识生活？既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观点问题。我遇到几位青年业余作者，很长一个阶段苦恼于“长期身在生活之中，却抓不到写的素材”。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都说“打开了思路”。其中有的同志就带着一两个概念，到生活中去寻找“故事”。故事搜集不少，仍然写不出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就又来找我诉说苦恼。我认为，在这方面只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

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除此而外，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作者胸中有了众多的熟悉的人物，按照人物自身的思想和行动逻辑，选择和编排情节，才能造成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故事性。体现着人物的阶级关系的矛盾斗争出故事，故事又为人物服务，才能塑造出活生生的、而不是概念化的典型形象。

上边提到的青年业余作者所说的“打开了思路”，另一种表现，就是到生活中专门寻找“反面”的问题和人物。比如，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去找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专搜罗这些人的言行，以他们为创作的出发点，再按照表现他们的需要，设置一个或几个正面人物，让他围着那些反面人物转。我认为，这样的学习和创作实践，是走到一条歧路上去了。发展下去，有重蹈当年资产阶级右派作家们“干预生活”、“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覆辙的危险。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唯有这样的典型，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意志，才能代表我们时代的风貌和本质，才能起到鼓舞、教育、团结人民同心同德跟敌人作斗争，发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我写短篇小说《铁面无私》，是从自私的农民（实际上是小生产者）闹房基地、侵占集体耕地这样的人物引起的，但在构思的时候，我总是嗅出一点“中间人物论”的味道，因此几次想写都写不下去。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了解和熟悉了一些坚决抵制“反面”人物的英雄人物，并为这些英雄人物所深深感动，才能比较自由地以英雄人物为主导展开矛盾和斗争，把我想回答而又应当回答的社会问题的卷子交给了读者。我写另一篇小说《一担水》，是先在生活中结识一个勇于跟传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

决裂的英雄人物。他在我的心中活了起来，使我忍不住地要用笔表现他。这时候，我根据党的基本路线，衡量、认识和理解他，再用他的思想和行为来对照生活中的“反面人物”，于是抓住了一个“对立面”，展开矛盾纠葛，形成了故事情节，完成了一篇作品。所以我体会到：作者把立足点立在无产英雄这一边，站在无产英雄的思想的高度，才能真正抓住生活本质和主流，选择意义重大的生活素材，也才能比较得心应手地突出英雄和主要英雄的典型形象。

最近，我在医院看到一个看病的小学生。他排在长长的挂号人的队伍后边。一个女护士要替他挂号，要拉他直接到诊疗室提前就医。原来，这个小学生的爸爸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可是，他坚决不这样做，还当场批评了女护士。如果过去遇到这样的事情，十有八九我会认为这种题材是别人写过的一般的好人好事而放过去。这一次，因为正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跟他在思想感情上产生了共鸣，就立刻抓住了它。我发觉在这个红小兵的身上，闪耀着一种共产主义的精神，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亿万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高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他对我改造世界观是个促进，对我认识现实生活是个启发。我应当向他学习，应当指挥手里的笔杆热情地歌颂他！作为一篇小说的材料，尽管矛盾斗争的故事情节还不丰富、不具体，但却已经提供很多借以思考和联想的线索了。

毛主席早就谆谆告诫我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一个作者能不能坚持这样做，决定他的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深度和思想高度。我们这些工农出身、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作者，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自满情绪，认为自

已生活够用，只欠艺术。这样的认识直接妨碍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实践，自然也妨碍手里的笔杆紧跟时代步伐。时代在飞奔，人民在前进，斗争生活丰富多采而又不断变化，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根据认为“生活够用”了呢？这种认识的本身就违反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是被文艺界一些同志认为“比较熟悉农村生活”的人，事实上，我对过去经历过的事情，并没有完全真正理解，而需要再认识；对发展着的现实生活，更需要从零开始，老老实实地去熟悉。

在写《金光大道》初稿的时候，我也认为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是熟悉的。写完第一篇稿，由于受真人真事局限，觉得没有概括出五十年代农村斗争生活的面貌和本质，以至于写不下去。后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教导，才渐渐认识到：要使自己在生活素材上跳出真人真事的局限，首先必须从思想认识上跳出局限；没有思想认识上的突破，就不可能达到典型化地反映生活。文化大革命前，我曾三次试图描写高大泉这样的人物。但在我的笔下，他不是围着一个“小脚女人”式的官僚主义人物转，就是围着一个“小算盘”那样的中间人物转，都没有能够写出他的真正高大和完美。文化大革命后写《金光大道》，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跟社员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站在今天时代的思想高度，重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重新认识我头脑中和本子上的生活积累。后来，又参加“一打三反”运动，用刚获得的新的生活斗争素材跟过去的生活积累加以对照、比较和选择。这样，使我不仅发现了除“小脚女人”、“小算盘”之外，还有张金发这样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高二林这样的刚刚得到一小块土地的

小生产者，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斗争的高大泉式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这使我认识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现实生活中，不是不存在高大泉式的英雄人物，而是我没有看到，没有抓住，我的思想框住了笔杆，笔杆又框住了人物。归根到底，是我头脑中缺乏马克思主义，没有把英雄人物身上的本质因素提炼出来。如今，这个人物形象仍然没有塑造到应有的水平，根源仍然在于我对新的斗争生活深入不够，在生活实践中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生活积累进行再认识的工夫下得不够。对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来说，到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中去，永远没有毕业那一天。作者的生活经历多一点，只是为他创作素材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并不等于创作素材就一定丰富。只有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观察事物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经过反复认识，达到对自己经历过的事物真正理解，才算掌握了创作需要的宝贵素材。被理解的东西越多越深刻，创作素材就越丰富。

学习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还要刻苦地磨炼我们手里的笔头，提高我们表现新生活的能力。要使作品努力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应当在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下，努力做到这样的统一。革命样板戏是坚持政治与艺术统一的典范，小说创作，要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特别是革命样板戏运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经验。要为无产阶级掌好笔杆，使笔杆不是单纯记录，而是艺术地反映生活斗争风貌，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有力武器。

## 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

毛主席谆谆地教导我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如滔滔江河，直泻奔流。广大工农兵群众，用自己的双手，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新人新作，似烂漫的山花，争妍怒放。党和人民，热情的期待着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当满腔热忱、浑身劲头，发扬敢闯的革命精神，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努力地大干快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新贡献。

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发扬敢闯的革命精神，必须“上着天，下着地”地闯，就是说，要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因此，它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觉得，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我们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在认识和实践方面都存在着差距。比如，在写作的活动中，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政治理论的钻研和提高，而过分热衷于艺术上的追求。或者只是在创作作品的构思、起草和修改的时候，才强调一下政治，也不过是表面地机械地套一套而已。甚至于只是为了给作品的人物加

上几句政治词句，才翻翻政治书籍。这都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灵魂。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思想的学习和运用，也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运用，贯穿到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全过程始终。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艺术的丰富多样，来源于生活的丰富多样。对于丰富多样的生活，有了正确的观察，才能有正确的体验，有了正确的体验，经过正确的研究、分析，才能使我们产生正确无误的认识；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进入创作过程，不是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结束，而是新的阶段的开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多次，在认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反复的修改。艺术表现手段是服从于政治内容的。不具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文艺工作者，不可能正确地观察社会；没有正确的观察，也不会有正确的艺术表现。

我自己在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社会这个问题上，有过一个相当长的从不太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如今还在提高的过程之中。《金光大道》这样的作品题材，早在一九五五年我就想写，也曾几次构思过。但是，由于没有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来概括生活、提炼主题、塑造典型，只是就事论事，越写越觉得题材平淡，英雄人物不高，甚至感到有点象马后炮的新闻报道，于是都成了废品。那个时期，我写了数量不算少的短篇小说，尽管我是努力地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但由于我没有自觉地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也是视而不见的，所以这些作品没有能本质地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

风貌。以后写作《艳阳天》，我开始觉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我回忆起自己在阶级斗争漩涡中没有看到阶级斗争的教训，初步地开始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但还是停留在写什么题材，就学那一方面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进一步深刻体会到：我们的文艺创作，是通过典型环境的描写，英雄人物的塑造，来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的。作者必须弄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写好某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生活，才能塑造好这一生活环境中的英雄人物，才能使作品本质地反映时代，为现实斗争服务。写《金光大道》的时候，我比较自觉地学习、运用党的基本路线了。一开始酝酿这部作品，我就反复地思考一个问题：尽管我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是有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但是，七十年代写五十年代的题材，要反映什么样的主题思想，要塑造什么的英雄人物，要回答七十年代的什么问题，要使今天的读者获得什么教益？这就要求作者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炼出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矛盾冲突，为英雄人物设计合情合理的典型环境，使其得以充分表现，发挥榜样力量，起到指导今天斗争生活的作用。要做到这一步，仅是凭着作者个人的生活实践经验不行，单纯借助艺术描写手法尤其不行，局限于了解和熟悉党在五十年代的具体政策也不行。必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作为观察生活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我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和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和按语等著作。用马列主

义的理论来分析研究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斗争，使我对反映在农业战线上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终将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革命群众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我还认识到，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今天，腐朽的、没落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一直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具有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反动性和顽固性；新生的、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具有勇往直前的原则性和坚定性。七十年代的矛盾冲突，是五十年代矛盾冲突的继续发展和深入。五十年代英雄们的斗争实践，从本质上讲，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着的斗争课题。我应当在《金光大道》这样的作品中体现这些基本思想。在作品的起草、修改阶段，我又反复读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解决创作中的问题。这样，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地有所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有所长进。我的小说没有写到预期的水平，是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还学得不够、掌握得不够。我要继续努力，认真读书，弄通马克思主义。

发扬敢闯的革命精神，还必须“下着地”，就是不仅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创作实践，而是应当首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也就是指导我们正确地学习社会。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这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循的原则。我们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不仅要在口头上承认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而且必须在行动上解决这个问题。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做到“长期”和“无条件”。为了写一个作品，下去跑跑看看，这是“短期”；到生活中去的目的，不以学习社会、改造世界观为主要目的，而是单纯搜集创作素材，这是“有条件”。前边讲过，要写一部反映中国农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说，是我好多年前就有的愿望，曾经两次起草又两次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我没有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社会生活现象。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六年，我只凭着自己当记者的时候，采访到的一点材料就写起来，写出初稿，失败了；第二次是写《艳阳天》以前的一九六一年，在山东到一个先进村子参观几天，听了一些故事，后来，刚搭个架子，就觉得没底，又失败了。这次写《金光大道》，因为自己的经历比较多了，政治觉悟有所提高了，眼界和思路都比较开阔了，构思的时候，不仅吸收了当记者采访来的材料，参观学习听来的材料，下放劳动和参加“一打三反”运动获得的材料，而且启用了我解放前后搞八年基层工作的时候亲身实践而积累的材料。帮助翻身农民耕种刚刚分到的土地，以及兄弟间因所走的道路不同而闹分家等等，都是我当时参加过和主持处理过的事件。由于这样的素材是“活”的，写起来，就有真情实感，顺手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房山县下放劳动期间和在顺义县搞“一打三反”的时候，我跟社员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在乡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也是我用今天的思想观点，重新分析、研究我过去所经历的类似生活的过程。每当开完一次批判大会，我回到住处，就“翻翻自己的

老箱底”，再独自开一次“批判会”。这样，许多过去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就认识到了。例如，建国初期，我搞了将近两年的生产自救工作，资本家通过包作抗美援朝军用的鞋底，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事件，我是目睹者。因为自己没有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题材的计划，也就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素材还有用项。“一打三反”挖出来的类似事件，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一直没有放弃农村这块阵地，不断变换花样向农村伸手。抵制他们的罪恶行径，是我们英雄人物的一个主要侧面。在构思《金光大道》第二部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内容写进去了。经验和教训使我认识到：不长期地扎到生活中去，不大量地积累火热斗争的素材，只靠跑跑看看，是观察不到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的；没有观察得清清楚楚，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体验。抓住一点表面现象的东西，自己并没有动心，就关在屋子里死写硬写，即使写出来，也不会真正感动读者，这样的作品，更不会具有生命力。

我经常警告自己：要紧紧地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我觉得，即使一个生活经历非常丰富、素材积累非常充裕的作者，也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只有放流的闸门，而没有进水源泉的“死水库”。怎么才能做到跟上时代的脚步，使自己得到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呢？我认为，一个写作者，彻底解剖几个单位，是很重要的。例如侧重写农村生活的，要解剖几个村子，解剖村子里边的各个阶级，解剖每个阶级的各个阶层以及典型的人物和事件。要熟悉他们的“来龙”——怎么发展过来的；还要紧紧地掌握他们“去脉”——将会怎样发展下去，一步一个脚印地跟上他们。我认为这才是对我们所说的“生活底子”较为全面的理解。因此，我认为每一个创作者都应当有几个长期深入的生活根据地，要跟那里的人民在感情上打成一

片。光靠见了群众很谦恭和气是不行的，必须跟他们在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在取得共同的斗争胜利果实的过程中，同甘共苦，相互了解，互相帮助，建立起阶级的感情。以这样的“点”，再带动面，再为完成一项具体写作任务到新的阵地去看看访问，“点”上的生活积累，就能帮助我们很快地深入到新的斗争中去。同时，即使短期下去，也应当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冲锋的战士，而不是材料收购员。一九五七年我以记者身分到一个农业社采访小麦丰收的新闻材料。当天夜间，这个社的一个村子发生了坏人抢集体粮食的事件。我听到消息，就摸着黑跟社干部一起赶到现场，一直到第二天晚上处理完这个事件才回来。由于有了共同战斗的经历，这里的干部不再把我当成客人，而当成他们的助手和参谋，我们的感情很快就打成了一片。结果我的采访任务完成了，还了解到许多新鲜的材料，并且有了一个新的生活根据地。五年以后，写《艳阳天》的时候，这次目睹手做的事情，就成为很重要的内容。我非常珍惜不带具体写任务，而以一个普通的工作组干部或下放劳动干部身分下乡参加实际斗争的机会。这样放下写作者的架子，丢掉写作者的条件，才能有机会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阶级，而不只是一个阶级；是一切群众，而不是一些群众；是一切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而不是一种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谁能做到这一点，他才能有“有出息”。写作的时候，他才会正确的方向、路线指引下，做到自然的感情喷涌，而不是生吐硬挤；他才会得心应手，而不致于抱着脑袋苦思冥想，他才会自己燃烧起来，锤炼作品中的英雄形象，而不会成为东摘一块，西掠一块，拼凑堆砌的偶像。在群众斗争生活中没有燃烧起来的作者，写作的时候，决不会燃烧起来。他的作品更不会使读者受到感动，并使之燃烧起来。当然，我在这方面只是有了一些认识，并没有完

全做到。时代在发展，人民在前进，我决心继续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写一辈子，生活一辈子，坚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闯下去！

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出现在我们的前边，我要努力地追赶。我希望自己象海军舰艇上的水兵那样，时刻听从党召唤，党指挥我往那里开，我就往那里顶风破浪地前进，决不迟疑，决不停俸！

（原载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北京日报》）